

从“群学”到“社会学”： 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形成与演变^{*}

张超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学学科概念术语的拟定与学科体制的建立,均为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晚清社会学分别通过两种渠道传入中国:以严复为代表的少数西学派直接翻译西方斯宾塞、赫胥黎等社会学家的著作,而东学派则通过日本为中介翻译日人译著,虽然严复等人的直译可能更接近西方社会学著作之原意,但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东学派最终还是战胜了严复对西方原典的翻译。最终严译的“群学”不敌东学派的“社会学”,本文通过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对社会学概念和学科地位的态度、晚清编撰的书目表和词典中“群学”、“社会学”出现的称谓变化、以及从日本与欧美留学生归国主体的变化来探讨从“群学”转变为“社会学”的大体脉络和变化机制。

【关键词】群学; 社会学; 概念工具; 变化机制

一、“群与社会”之古义辨析

中国古代并无专门的“群学”概念,不过关于群的记载则散见于浩瀚的古代文献中。兹举以下例子作为代表:

聚集、组织、会合之意:

《荀子·王制》:“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①

有组织的人类团体之意:

许慎《说文解字》中称:“群,辈也。从羊,君声。”又说:“辈,若军发车,百辆

^{*} 收稿日期:2012-03-01

作者简介:张超,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方向2010级硕士;E-mail:

① 《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3月版,第35页。

为一辈。从车,非声。”

众多之意。《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社。”^①

社会二字,古时一般分开使用。“社”通常用来指代土地神,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就有“后土为社”的记载。会被用来指代器物的盖子,如《说文·会·段注》中称:“《礼经》:器之盖曰会,为其上下相合也。”^②而将“社会”合称,古义多指旧时于春秋社日迎赛土神的集会。并非现代意义上社会概念。

邑人聚会之称之意。

语出汉代刘熙《释名》:周制九夫为井,其制似井字,四井为邑,邑犹悒也,邑人聚会之称也。^③

以上所举均为“群”与“社会”在中国古代的人们习用的主要含义,从上举数例中,可看出,古代中国的“社会”反而不如“群”更接近于今日的社会之义。

二、社会学形成史的相关学术史回顾

对于社会学形成史,前人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了解该领域的学术史,不仅可以避免因使用相同材料而导致重复研究甚至出现研究的倒退,同时也可明了前人对此问题研究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那些有待进一步开拓的研究空间。

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形成史的研究成果,在专门著作方面,有姚纯安的《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5)》,书中从与 sociology 相关的史料入手,通过分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各自涉及学科体系下群学的位置、引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的分析方法来探讨晚清革命派与维新派关于民族主义、合群思潮、民初社会问题的讨论,是目前关于晚清民初社会学史最为深入的研究之一,不过该著由于运用日本方面材料不足,虽然作者已经意识到“本来在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中几乎不见社会一词,但在他1904年翻译的《社会学通论》中,社会一词的使用则超过了群一词的使用。尽管严复之译著日益盛行,但其所译名词在东学派的攻击下,多不能有效地“生存竞争”,最后保留下来的甚少。”但对东学派的社会学最终战胜严复的群学分析不免过于薄弱。^④同时该书对欧美教会学校及留美预备学校对中国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另一本阎明所写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则弥补了西方在华学校在社会学科独立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只是该书写得是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在中国”,对相关问题论述的不够深入。^⑤此外,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从思想史的角度,通过作者深厚的西学背景,看出严复与斯宾塞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目的上的差异,斯宾塞研究社会学目的重要在于解释社会,而在严复看来,这些原理不仅仅在解释社会,而且还是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斯宾塞的思想正

① 王力等主编:《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第4版,第321页。

② 王力等主编:《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第4版,第338页。

③ 汉·刘熙《释名》,收入清王谟辑《增订汉魏业书八十六种》,卷1,《释州国第七》,8471页。

④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1版,第109页。

⑤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好为达到这一富强目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启示。”^①而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通过网络数据库的办法对相关概念名词进行统计，归纳其意义所作出的分析，发现1903年前后是群学转变成为社会学的关键年份。^②另有沈国威和冯天瑜的著作从新名词的角度涉及到社会学。

与前述著作相比，相关的研究论文则在数量上增长不少，不过质量则参差不齐，兹列举其中重要及笔者目前所见者：如陈旭麓先生的《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该文意识到维新派手中的“群学”，是借西方的社会学来发挥自我的群体观念，已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原型，其实他们对西方的社会学不太了然。^③而王宏斌在《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一文中，认为群学为“资产阶级建立本阶级政治团体的学说。”^④另外，黄克武先生在《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严复、梁启超与章太炎所译社会学之研究》一文中提出“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倾向。一种是严复与梁启超受章太炎所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到斯宾塞的影响，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一种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的影响，采取转化取向的社会学传统。”^⑤而黄在另一篇论文《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典和制汉语的竞赛》中，通过“从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到1911年刊行的《普通百科大辞典》作为考察指标，《新尔雅》仍有不少严复译语，然至《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日译新名词则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义译的翻译语，如官品、部勒、群学、名学、天直、等，这些严译词汇几乎都不敌日译新名词。”^⑥

由于学识和时间的限制，本文无法在与近代社会学学科形成史的相关具体研究中取得大的突破，笔者拟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对社会学概念和学科地位的态度、晚清编撰的书目表和词典中“群学”、“社会学”出现的称谓变化、以及从日本与欧美留学生归国主体的变化来探讨从“群学”转变为“社会学”的大体脉络和变化机制。

三、西方与日本社会学的输入

与其他西方社会科学相比，社会学这门学科出现较晚。1838年，法国哲学家孔德所著的《实证哲学教程》第4卷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为社会学出现的开始。孔德之所以创立社会学，是因为“人类对于各种自然现象—机械的、无机的、有机的，都已有专门的学科分别进行研究，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这些学科，依据其研究对象的逐渐复杂而依次精深。同自然现象相比，人类社会组织最复杂，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也最精深。因此，社会学是最晚出的一门学科，应当是

①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96年4月第1版，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2页。

② 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97页。

③ 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④ 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⑤ 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严复、梁启超与章太炎所译社会学之研究》，《文汇报》，2011年8月23日。

⑥ 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典和制汉语的竞赛》，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月1日。

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并且要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的“科学之王后”(queen of sciences)^①只是孔德本身作为实证主义哲学家,在他那里,社会学并没有脱离哲学的母体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并未获得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专业性。

比孔德稍晚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加以改造转化,形成“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其于1873年发表《社会学研究》(即严复所译《群学肄言》),书中提出社会有机体说,认为“不论对个体还是群体,组织的发展必不可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新的组织,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发展。”^②

社会学真正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般认为是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1895年发表《社会学方法论》,并随后创办《社会学年鉴》为标志,并且涂尔干还最先在大学里开设社会学课程。

西方社会学早期输入中国,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在教会学校开设社会学课程,并进行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在教会学校最早开始社会学课程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年美国传教士阿瑟·孟以当时在美国流行的白格达《物理与政治》为课本,教授社会学。此后,沪江大学神学院也开设了“伦理学与社会学”课程。1914年,该校还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到1915年,美国传教士步济时在1914年到1915年,知道清华学校学生开展了北平人力车夫的调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③但是早期的西方传教士研究社会学主要是为了方便于传教工作的开展。

几乎与西方社会学诞生同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日本最早将社会学称为交际学,1867年,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外编中将其翻译为“交际学”“人间交际学”。直到明治十二年(即1879),文部大辅田中不二磨的报告中首次出现“社会学”译名。在日本人所编撰的字典中,时任东京大学副教授的井上哲次郎与东京大学毕业同窗和田垣谦三、国府寺新作、有贺长雄合作,以英国哲学家弗列冥的《哲学字典》第二版1858为原本,译编《哲学字汇》,明治十四年(1881)年初版,前后有三个版本。分别于1881年1912年再版两次,Sociology的译名也从世态学到世态学、社会学再到社会学。^④

日本最早的社会学明显的受到西方社会学科体例的影响,将社会学归入到哲学、文学之下。

四、时人对“群学”、“社会学”的取舍和认识

甲午一战,中国败于昔日的学生日本,在这一残酷悲惨的事实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焦虑中国未来的前途,思考中国的命运,维新派也趁势而起,其中以严复所翻译英国哲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为肇端,严复主张“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

①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页。

② 赫伯特·斯宾塞著,张宏晖等译:《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54页。

③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8-12页。

④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第1版,第351页,第5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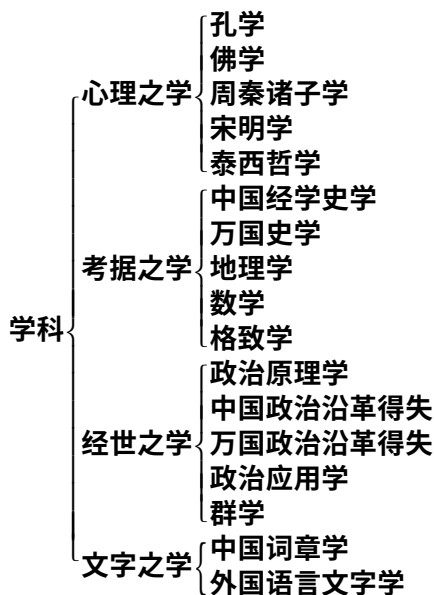
曰物竞，曰天择。”“盖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①合群成为保种保国的手段，维新派也将群学作为其变法改革的理论武器。

维新派的群学思想，以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为代表。康有为在 1896 年所编的《日本书目志》中，收罗了二十一种日本人所著或者翻译的社会学著作，二其中就包括有贺长雄所著《社会进化论》、斯波贞吉著的《国家的社会论》，乘竹孝太郎译的《社会学之原理》等，其中有八篇是日本人翻译西方的社会学译著，可见日本当时的社会学海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

据前人研究，康有为所编的书目实为日本在上海的书商的营业书目，其是否看过这些书籍现已无从得知。^②不过在书目后的按语，则可反映其对社会学的理解程度：“大地上一大会而已，会大群，谓之国会；会小群，谓之公司，谓之社会。社会之学统，合大小群而发其形。合之条理，故无大群。小群善合则强，不善合其会则弱。泰西之自强，非其国能为之也，皆其社会为之也……英国有“保国会、保王会，天文化电光重声汽学皆有会，制造农业商务女工皆有会，其名多不可悉，数日人之骤强也，亦由听民间社会讲求之。故政府以一人任事，精神日力皆有限也；必不能致精。民会则合亿万人之心思，专门讲求，其事事新辟故也。”^③

显然，康有为理解的社会学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社会学，而是借此阐发其合群立会的政治主张。

梁启超《康南海传》称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开设群学和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得失等课程，将其并列为“经世之学”。^④



①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3 页，第 34—35 页。

② 沈国威：《康有为与《日本书目志》，《或问》，2003 年第 5 期。

③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日本书目志》，第 200—203 页。

④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年 7 月第 1 版，第 481 页。

康有为此处没有用社会学而用群学,说明梁在作此文时(1901年)用群学指代社会学,同时也可见康有为在课程设置上力图将西方的分科之学条目一同纳入到传统经世之学的体系中来。

梁启超借群学来表达其合群立会主张的意图更为明显,他于1896年发表《说群》一文,强调“天下之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而其勃兴也若此。梁将泰西之群归为“国群”,将国群对应康有为三世说中的升平世,将天下群对应太平世。认为“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①

中国最早使用社会学这一新的学科名目的,是谭嗣同。他在1896年完成《仁学》第一章《仁学界说》中提出二十七界说,企图将中国的儒佛与西方融为一体,其中二十五界说为“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二十七则是:“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②二十五界说中的社会学接近于西意社会学科目,而二十七界说则又接近严复对于群学的定义,是其阅览相关书籍摘录还是其他原因至此,有待考证。不过如果在参考其《壮飞楼治事十篇群学九》,其更多的还是在阐发其合群立会的思想:“儒而入会,于是无变书院之名,而有变书院之实;释老而入会,于是无变寺观之实;农而入会,于是无农部之名,而有农部之实;商而入会,于是无商部之名,而有商部之实……戒时文有会,发墨守也;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此也。”^③谭嗣同还不是在学科名目意义上厘定群学和社会学。

与维新派提倡合群立会的“群学”相比,严复对“群学”的理解无疑更接近西方社会学的原义。严复认为“中国名为用儒术者,三千年于兹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民,一旦外患忽至,则糜烂废痿不相保持。……儒术之不行,固自秦以来,愚民之治负之也。”中国富强的根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然则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要开启民智,必先治西学,而“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群学在严复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总揽其他科学的作用。但严复认为欲致群学,必先治格致之学。

“何则?格致之学不先,偏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也。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力学者,所谓格致之学是也。质学者,所谓化学是也。名数力质四者已治矣,然其心之用,犹审于寡而荧于纷,察于近而迷于远也,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何则?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未由于

①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93页。

② 罗炳良主编《仁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8页。

③ 加润国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谭嗣同集》,第148页。

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故人学者，群学人德之门也。人学又析分而为二焉：曰生学，曰心学。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①

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严复将其对西学各科关系的理解阐述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诸公在此考求学问，须知学问之事，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何谓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等应用的自然科学。一、公家之用。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玄学一名、二数，自九章至微积…人不事玄学，则无由审必然之理，而拟于无所可拟。然其事过于洁净精微，故专事此学，则心德偏而智不完，于是，则继之以玄著学，一力，力即气也。水、火、音、光、电磁诸学，皆力之变也。二质，质学即化学也。然玄著学明因果矣，而多近果近因…而无悠久繁变之事，而心德之能，犹未备也，故必受之以著学。著学者用前数者之公理大例而用之，以考专门之物者也。如天学，如地学，如人学，如动植之学。至于人学…必事生理之学…又必事心理之学，生、心二理明，而后终之以群学。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凡此云云，皆炼心之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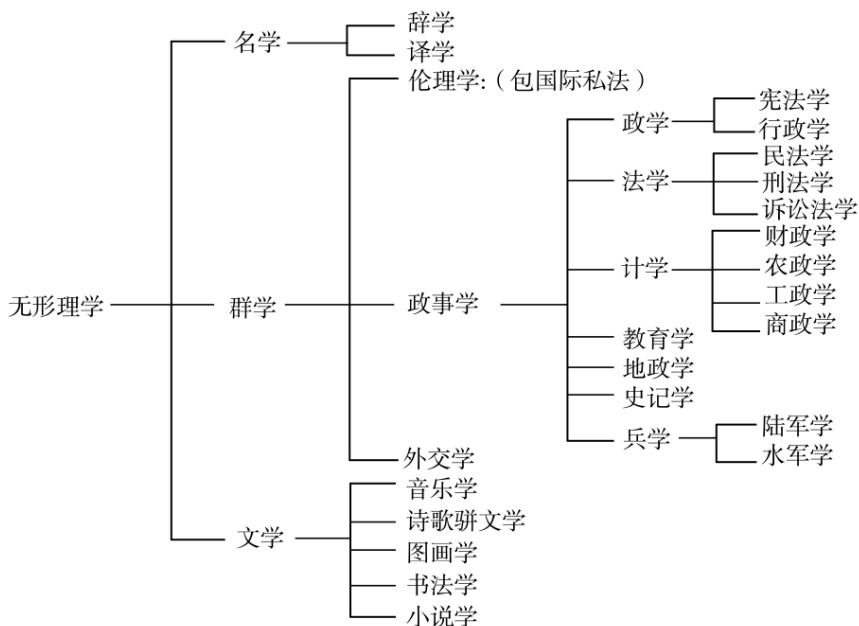
严复又在译《群学肄言》序中对群学下了定义：“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而群学的作用在于“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正德、利用、厚生）操其本耳。”^③严复的群学有今天社会科学之义。

蔡元培则将社会学纳入到哲学之下，他认为“日本井上甫水，界今之学术为三：曰有形理学，曰无形理学（亦谓之有象哲学），曰哲学，（亦谓之无象哲学，又曰实体哲学）。无形理学为有形理学之统部，统部即尽稽万理之义。”

^① 《原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页，第548—550页，542页。

^② 《西学门径功用》，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页，第576页。

^③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页，第115页。



对于小说，作者特别推崇，认为“小说者，民史之流也。群学家曰：前史体例，其于事变也，志其然而不志其所以然，且与君公帝王之事，虽小而必书；于民生风俗之端，虽大而不载；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无可稽。我国史记，自太史公以外，皆此类耳。近世乃有小说，虽多寓言，颇详民俗，而文理浅近，尤有语言文字合一之趣。”

“右举学目，皆取易于识别，故或采译语，或用日本人所定。”群学一词即采纳的是严复的译语而非日本人所定。

蔡又将哲学划入通科科目，而将社会学原理划入专科，此处又用社会学，笔者猜测其对群学和社会学理解应不指同一物，社会学更多的是受日本影响。“《易》如今之纯正哲学，则通科也。近世哲学名家斯宾塞氏有综合哲学原理，为通科。又有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道德学原理，为专科，亦其例矣。”^①

同时蔡元培还运用社会学原理来表达其对科举制改革以及培养专门人才的主张。“群学家曰：有一事之效实，必有一事之储能。官，效实也；学，储能也。《语》曰：学而後入官，此其义也。他认为中国过去科举考试培养出的官员，”兼摄数职，历官六部，乃责以兼九家之所长，种瓜而望豆，缘木而求鱼，其不得所期之效，而转生意外之害。”主张要：“兴学之始，宜废科举而改官制，以卒业之凭为中式之级，因专门之学，授职之官，夫而后耳目齐、风气一也。”^②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145页。

②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146-148页。

普通学级表

大别名	初级（六岁起）	二级（八岁起）	三级（十一岁起）	四级（十四岁至十七岁）
群	对亲长伦理	家庭乡党伦理	国民伦理	伦理通理
		地理略说 外国地志略	本国地志 交涉各国地志	本国地志沿革略 外国地志
			国政纲要	本国历史 外国政略 外国史略
				法学纲要 计学纲要

女子普通学级表

（普通学初二级，男女同；三级以上始异地。其课程亦有异同；故表之）

大别名	三 级	四 级
群	国民伦理 本国地志 国政	伦理通义 外国地志略 本国历史 外国政略 法学、计学纲要 家事

相对于男子的普通学级制而言，女子课程内容要简单的多，而且增加了家事的课程。蔡元培认为泰西女权之盛，已有充律师、凯议员者……盖群学家所考，男之与女，内外分职，自原人而已然。其合于天然之理与否，虽未有定论，而习于性成，骤赢于此，必绌于彼，其关于人世之祸福也剧矣。我国女权尤稚，尤不可不受之以渐，学程所揭，详家事而略国政者以此。^①

而宋恕则不同意康、梁、严、蔡使用群学来指代社会学的主张，而直接取社会学之名。在其《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中称：“演说分二部：学术部、时事部，而学术部又分总、别二科：总科分二目：哲学… 社会学（按康、严、梁、蔡等著译，于日本人所立之社会学均改为群学，于谊不合。）按社会学创立最晚，名家或列于科学之特体，或列于哲学之分体，或列于科学、哲学之外自为一体，鄙取第三。盖以科学皆局而此学则通，似不宜列于科学之特体。哲学思想由复杂趋单纯，而此学思想则由单纯趋复杂，似不宜列于哲学之分体。”既不同意严复将社会学纳入科学体系中，也不同意蔡元培等人将其纳入哲学之下。在他1901年10月2日给求是书院出的考题中，直接用了社会学的名称：社会学题目定为“国多海滨，民易进化说。”^②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151-152页。

② 胡珠主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2月第1版，第350页，第319页。

五、群学与社会学之争：“社会学”译著的出现与传播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本社会学译著是章太炎于1902年8月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翻译成中文。在该书的序言中,章认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匿于知来者。”对于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不能满意,而引入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的心理社会学,“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傲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

章氏复认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也有问题,人有社会性,但同时有非社会性。应俱分进化,而非只知进化。“日本言斯学者,始有贺长雄,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余浮海再东,初得其籍,独居深念,因思刘子骏有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固知考迹皇古,以此先心,退藏于密,乃能幹人事而进退之。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

章氏十分推崇岸本氏这本社会学著作,认为“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虽异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①

章太炎此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新民丛报》为该书刊登广告,指出:“社会学为最晚出之科学,而亦最宏大最切实之科学也。近三十年来,其在欧美学界,渐有掩袭百流一炉同冶之势。而吾中国犹瞢然不知天地间有此种学,良可慨也。自侯官氏述天演论,略闻斯旨,学者渐知重焉。而赫胥黎非此学专门,《天演论》又其东鳞西爪,故于此而欲窥完全新拔之学说,难矣。”同时又介绍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岸本氏之作,本为日本专门学校讲义录,复几经订改,以完成书。虽非有所独创,然其荟萃西哲最新之学说……实初治此学者最善之本也。”对章太炎翻译此书评价甚高:“译者于祖国学术博而能通,其所定名词,切实精确,其译笔兼信、达、雅三长,诚译坛中之最铮铮者也。今年以来,译事骤盛,而所选之书,率皆普通之历史、地理等,而于高尚专门之学科,阙焉无闻,实译事不发达之明证也。若此书者,其可称为译界一明星乎?”^②

《新民丛报》对章太炎译著的评价,认为其译笔兼信、达、雅三长,而这是严复译著的标准,章氏此书批评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与社会进化论,亦是严复思想体系立论的基本依据。这无疑是在方法论上否定了严复的思想体系。

继章太炎之后,留日学生刊物中,又有《翻译世界》将日人远藤隆吉翻译吉丁斯《社会学原理》一书的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该译本采用的是社会学概念,它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者,所以明社会构造之元素,而发见其支配之法则与生存淘汰之原理

① 姜玠编选:《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社会学自序,第92页。

② 《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

者也。”^① 1903年3月，吴建常翻译日本市川源三译吉丁斯《社会化论》一书，以《社会学提纲》为名，由教科书译辑社出版。

上举只是其中一部分例子，不过也可看出当时日本留学生中直接使用日本定名的“社会学”较多，少有使用严译群学。

章氏的译著以及日本“社会学”概念的流行，对严复的影响目前笔者还未找到直接证据。不过严复此时也正着手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于1903年出版，他未采纳日译的“社会学”概念，而定名为“群学肄言”，他在该书的“译余赘语”中称书中将的“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也就是说，该书研究的是社会学的方法。而确如严氏所说，只是该书所说的方法，并不是斯宾塞的方法，而是严复本人的方法。在该篇中，

严复称：“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虽然知之难矣，使徒知之…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故＜缮性＞尚焉。”缮性，今译为智力训练。“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② 其下分别是宪生和述神、成章，今译为生物学上的准备、心理学上的准备以及结论。笔者翻阅斯宾塞现在的汉译本与严复译本比较，发现中间为严复添加部分不少，举《缮性》与智力训练中一例进行比较：

因此一种适当的思维习惯在社会学研究上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思维习惯只有在对各门科学作一个大体上的研究时才能获得，因为社会学是这样一门科学，他包含了所有其他科学的各种现象。他描述了各种抽象科学研究的那些必需的关系；描述了研究者从具体抽象科学中熟悉的那些因果关系，提出了同时发生的多种原因和偶发性结果的产生，这一点我们在具体科学中看到，尤其是在有机科学中。因此，为获得有助于社会学正确思维的思维方式，头脑必须熟悉每一科学种类所呈现的那些基本的观念，而不应受制于某一类或某两类科学的基本观念。^③

而严译则是：“是故欲治群学，非先治心习不可。然而心习非虚而无验，若俗所谓心术者也，思理之所由通，识地之所由实，皆于此而课之。欲保其天明，而祛其物蔽者，舍科学之磨砢锄溉，殆无由矣。盖群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今夫例立而无不骇，物生而莫得外，取一切形神道器，表里精粗，而莫不举者，名数二科是已。故名理算数者玄科也，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循之物情者也。而群学首以之，则玄科之治，不容缓矣。理由玄而渐著，虽然，未遽著也，而有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力诸学之所有事也。二者介于形上形下之交，而皆为名数之所纬，至于其理，则因果对待是已。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番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地人物诸学…是故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以本之为心习，夫而后有善事之利器，是三科者，取其一而遗其二不可也，为其二而靳其三亦不可也。”^④

① 《翻译世界》第1期，1902年12月。

②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页，第118—120页。

③ 赫伯特·斯宾塞著，张宏晖等译：《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282页。

④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50页。

从上述两段译语中，“社会学是这样一门科学，他包含了所有其他科学的各种现象。”变成了“盖群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而“治群学必先治玄间著三科之学”更是在原文中没有出现的。

严复将社会与群加以区别，以应对东学派社会一词的挑战，其并不反对日译的社会，只是将它的内涵和外延缩小：“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社会被包含在群之中。

1904年严复又翻译了甄克斯的《政治简史》（a history of politics），他并没有直译，而是译为《社会通论》，社会一词的使用则超过了群一词的使用。尽管严复之译著日益盛行，但其所译名词在东学派的攻击下，多不能有效地“生存竞争”，最后保留下来的甚少。^①

从留日学生编译的字典中亦可看出“群学”在“社会学”的竞争下败下阵来，汪荣宝、叶澜主编的《新尔雅》，该书专设一章《释群》，第一篇总释，其内容包括：将群及群学定义为“二人以上之协同生活体，谓之群，亦谓之社会。研究人群理法之学问，谓之群学，亦谓之社会学”；将社会学分为：“以群为实物而研究推断者，谓之唯物论群学；以群为心相而研究推断者，谓之唯心论群学；以群为成乎物心二元而研究推断者，谓之二元论群学；调和二元论群学者，为合一论群学。。。。”该书已有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定义，“废私有财产，使归公分配之主义 谓之共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

錄			目			
釋 幾 何	釋 名	釋 群	釋 教 育	釋 計	釋 法	釋 政
釋 植 物	釋 動 物	釋 生 理	釋 化	釋 格 致	釋 地	釋 天

目录设置以科目为标准，作者将群学分为静群学和动群学，静群学定义为：“叙述群之现象者，谓之静群学或谓之社会现象论”。作者将群之发生、家族、国家列入静群学之范畴；而对动群学，作者定义为：“推阐人群之推迁者，谓之动群学亦谓之社会运命论，书中将人群之理想与人群之进化归入到动群学中。而在第四篇释群理中，作者把人群要素与人群之成立列入到群理当中。《新尔雅》为当时留日学生汪荣宝、叶澜所编，其受日本社会学著作影响自不待言，该书首次全面对社会学概念进行厘定和解释。从其将所论“研究人群理法之学问，谓之群学，亦谓之社会学”^② 亦可见当时留日学界

①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1版，第109页。

② 汪荣宝、叶澜主编：《新尔雅》，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第三版，第62页。

已普遍将群学与社会学等同起来考察。只是书中对社会学概念的解释究竟参考了哪些日本社会学以及留日学生翻译的社会学著作，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究。

但是到了 1911 年，黄摩西编著刊的《普通百科大辞典》已经不见“群学”的踪影，统计的所有条目中，总共有七种是与社会学有关。^① 留日派的社会学战胜了严复所译的群学。

思想文化的传播，必须依靠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以及传播对象的呼应，三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取得传播效果。“社会学”一词本为日译词汇，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纷纷留学日本，在大量留日学生作为传播主体，严复显得孤军奋战，与此同时，东学派利用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其本身已是传播对象，如果还考虑“严复翻译好用单音词（如计学、群学等），不敌复合词（如经济、社会等）在意义传达上的丰富性”^② 以及严译古奥难懂的特征的话，社会学代替群学就不难理解了。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条目数

总数	分类名称	简称	条目数	分类名称	简称	条目数	分类名称	简称	条目数
政治	宪法	宪	33	行政法	政	71	法律学	法	30
	民法	民	32	商法	商	66	诉讼法	讼	29
	刑法	刑	20	国际法	际	27	计学	计	10
	财政学	财	35	统计学	统	14	簿记学	簿	17
	军政	兵	215						
教育	本国史学	史	196	世界史学	O 史	1593	本国舆地	舆	439
	外国舆地	O 舆	439	哲学	哲	82	教育学	教	89
	宗教学	宗	244	心理学	心	41	伦理学	伦	4
	名学	名	16	社会学	社	7	国文学	文	54
	世界文学	O 文	21	言语学	言	32	图画学	图	36
	雕刻	雕	7	音乐	音	131	装饰	饰	13
	游戏	戏	20						

六、社会学学科体制的建立

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参照郭双林对地理学产生标志的认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大学社会学课程的设置和社会学教课书的编撰；二、社会学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刊物的创办；三、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

① 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研究》，第 195 页。
② 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典和制汉语的竞赛》，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2 期 2008 年 12 月 1 日。

应用。”^①

社会学在晚清中国一直未取得独立发展的契机,它往往与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论争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② 学科发达与否,最好的体现莫过于官方的学科建制之中,

在1903年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将社会学命名为“公益学”,在各分科大学科目第二章中,将其纳入经学之下:

第一节 经科大学(理学附)

凡治经及理学者,无论何门每日讲堂钟点甚少,应于以上各科目外兼习随意科目如下:

第一年应以中国文学、西国史、西国法制史、心理学、辨学(日本名论理学,中国古名辨学)、公益学(日本名社会学,近人译作群学,专讲公共利益之理法,戒人不可自私自利)等,为随意科目。”第二年第三年公益学也被列入随意科目之中。

对于随意科目的安排,“此时初办碍难全设;应俟第一期毕业后体察情形,酌量渐次添设。各分科大学之随意科皆同。”^③ 足见当时对 sociology 不重视之程度,亦可反映出张之洞对 sociology 的理解附会之处颇多。

而到了1913年1月公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社会学的地位并未有所改观,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新增)三科纳入到大学法科之科目下,而社会学仅仅只是政治学门下的课程之一,足见当时 sociology 在大学中不仅没有独立的院系设置,本身也只能寄在政治学科目之下。地位非常的尴尬。^④

sociology 真正在国家学科体制中确立其独立学科的地位,要到1929年,国民政府效法美国改科为院,增加社会学,社会学列为哲学、政治学、法律学、医学院及文学院的必修课,在其他院系则为选修课。^⑤

留日学生在近代中国 sociology 的形成过程中只扮演了 sociology 名词的拟定工作者的地位,而 sociology 要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则主要通过欧美留学生来得以实现。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中,不少即出自清华学校派遣的庚款留美生,其中孙文本、李景汉、潘光旦、吴文藻等人都有留学美国的经历,他们于中国20年代纷纷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批独立的社会学学者群。^⑥

与他们纷纷回国的同时,在此之前,1916年北大才开始首次开设 sociology 课程,而中国第一份专业社会学期刊《社会学杂志》于1922年由余天休创刊。对于中国 sociology 学科发展而言,1930年左右,可以认定为 sociology 学科独立的标志,这一年,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成立,孙文本当选为正理事,许士廉任副理事,吴景超任书记。与此同时,由南京中央大学 sociology 系教授孙文本主持,组织全国10位学者编著教材15种,分别论述 sociology 原理、方法、历史及各专门领域,于1929到1930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后合订

①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29页。

②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70页。

③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578页。

④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644-659页。

⑤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⑥ 关于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简介,请参见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7-32页。

为《社会学大纲》，共计 1652 页。这是中国人自编的第一套中文社会学教材。

参考文献：

- [1] 荀子：《荀子》，中华书局，2011 版。
- [2] 王力等主编：《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 版。
- [3] 汉·刘熙《释名》，收入清王谟辑《增订汉魏业书八十六种》，卷 1，〈释州国第七〉，1985 年版。
- [4]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
- [5]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版。
- [6]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7] 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
- [8] 赫伯特·斯宾塞著，张宏晖等译：《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 年版。
- [9]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 年版。
- [10]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 [11]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日本书目志》，1922 年版。
- [12]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
- [1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 年版。
- [14] 胡珠主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 年版。
- [15] 姜玢编选：《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社会学自序，2000 年版。
- [16] 汪荣宝、叶澜主编：《新尔雅》，上海文明书局发行，1915 年版。
- [17] 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研究》，2006 年版。
- [18] 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 [19]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版。
- [20]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
- [21] 沈国威：《康有为与《日本书目志》，《或问》，2003 年第 5 期。
- [22] 《新民丛报》第 22 号，1902 年 12 月 14 日。
- [23] 《翻译世界》第 1 期，1902 年 12 月。
- [24] 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典和制汉语的竞赛》，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 年第 62 期。
- [25] 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严复、梁启超与章太炎所译社会学之研究》，《文汇报》，2011 年第 8 期。
- [26] 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
- [27] 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